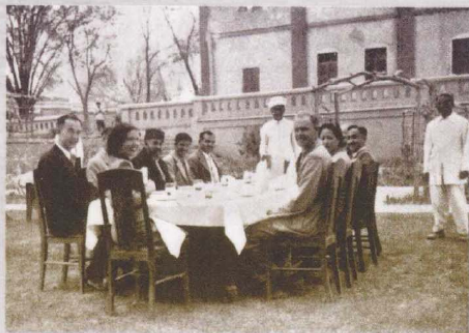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杨镰◎主编

Series of Western Regions' Exploration



◎【英】凯瑟琳·马噶特尼 戴安娜·西普顿 / 著

◎王卫平 崔延虎 / 译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它深奥难懂，又朴素无华；它冷峻刻板，又海纳百川。几乎所有的西域探险家都品味过它的温馨、它的古朴，它的多变和它的不变，都有过伴随终身的喀什噶尔情结，都在自己的书中为喀什噶尔辟置了专门的章节。可以肯定，没有喀什噶尔，西域探险史就完全是另一个结构了。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UBLISHING HOUSE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杨镰◎主编

◎ 王卫平 崔延虎 / 译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出版说明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后,文献中有了关于西域的正式记载,而历代对于西域的界定,又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域的主体部分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辖范围。因此,人们往往会把西域——新疆作为同一概念联系起来使用。

西域这一片位于中国西部的广袤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地理位置独特。几千年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人们,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先行者一起开拓经营,创造了辉煌一时的历史。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贯穿全境,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会,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荟萃的特点。然而,自14世纪以后,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改变、海运的畅通,以及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片曾是东西交通枢纽、人类几大文明的交会之地,逐渐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从17世纪起,在世界列强扩张殖民地、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西域重新吸引了人们关注的视线。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出现与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不同国度不同学科的探险考察者纷至沓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高潮。而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觉醒使一批抱着固边强国愿望的有识之士也形成了一股西行考察的热潮。尽管这些探险考察者的目的不同,一些人的行为受到指斥,但他们以全新的视角和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观察与探索着新疆,他们让世界了解了新疆。因此有人说,20世纪是重新发现中国西部的时期。

20世纪末,中国有了近2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经济建设战略重点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设想被提出,而中国学术界也在西域历史文化、敦煌吐鲁番学与丝绸之路研究等有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总结10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西域的探险考察历史,让人们真实、准确、全面地认识西域、了解新疆,并为今后的考察与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共识。从出版者的角度来说,那些考察著述,不仅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也呈现了雄奇壮阔的西域风光、神秘诱人的古代遗址、多姿多彩的西域风情、惊险曲折的探险经历,更是难得一见的出版资源。于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一套大型系列丛书《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一版)。

丛书第一版总主编宿白,主编马大正、杨镰、陈重秋、荣新江,另设编委14人。丛书选题设计主要包括三大部分:(1)外国探险考察者的著述。(2)中国历史上关于西域考察的



著述。(3)现当代中国学者的探险考察及其著述。但由于多种原因,在实际出版过程中,主要实施的是第一项规划。共计出版了十余种著作,部分图书还以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面世。在这一过程中,编译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炼句结章、索证求实,其艰难程度甚至会超出原创作品;而主编运筹调度、加工润色、事必躬亲的作风也体现了传统的学者风范。丛书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随之而来的相关出版热潮,促成新疆人民出版社塑造出一个自有品牌。

1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对西域探险考察的认识更加明确,了解也更为深入。当更多的资料被发现、更多的研究成果呈现在面前时,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二版。在新版中,除保留原有的部分选题外,又新增了20多种,计划出版30种。在新版的选题中,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是基本原则。在西域探险考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富于生动细节、符合一般读者阅读兴趣的著作被优先选用。中国作者原创性著述占有一定的比重,是新版图书在选题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图文合一、相辅并重是这次新版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近年来西域探险考察的研究进展与新的发现是修订整理的依据;读者定位与市场反馈是必要的参考;而由主编为每一部著作写一篇导读性序言,则是继续保持的风格。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大正先生为丛书撰写了总序,提纲挈领,开宗明义。读者藉此,不仅可对西域探险考察的性质与意义了然于胸,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将获益良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第二版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宿 白^①

新疆考古发现与西域文明



中国的19~20世纪之交，以古代文明再发现著称。

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年，道士王圆箓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皕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① 宿白：北京大学考古系原系主任、教授。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为千年流沙湮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汉书》的楼兰故城。沙埋故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间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更名为鄯善)的边境重镇。王国维《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故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培”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鄯善)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佉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佉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想象之词。楼兰故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佉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意是“城镇”。“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佉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故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现代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故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

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寻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赫定终于见到了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入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入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中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



的主要经济来源。

除了《东国公主传入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

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经了当地人叫“喀喇墩”的故城。故城为沙子覆盖，喀喇墩，含义正是“黑沙包”。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喇墩故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喇墩故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丹丹乌里克、喀喇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喇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却由来已久。楼兰故城复显于世，为人们了解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故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探险家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

代历史的一部分。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以致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喇墩故城、楼兰故城、尼雅古绿洲等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在西域,“丝绸之路”是贯通东西方文明的通道。西域文明的特点,来自它的地理位置、人文构成、历史变迁等因素。

西域文明,是中华民族包容性、丰富性、和谐性的体现。西域文明,使中华文明增添了广被四裔的影响力。

从斯文·赫定开始,来新疆的外国探险家回国之后,总就其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西藏》,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①,先后出版了50多种著述,成为认识中国西北的系列读物。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

^① 中瑞共同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文原称“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统一作“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不但拥有众多读者,而且影响深远。

20世纪9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十余种探险纪实之作,在读书界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新一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我希望新的大系有机会补救第一版的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出于技术与成本问题,曾删去了书中的绝大部分插图,而这些插图与文字一样,都是忠实的历史记录。再者,为重现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一些书比如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不能忽略。另外,确定入选书目时,一定要可读性、纪实性并重,等等。

相信具有了上述特点的新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能成为认识新疆的长线读物,拥有不同年龄段的读者。



● 马大正^①

中国边疆研究60年与西域探险考察



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正如中国边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样,中国边疆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以西北史地为例,清人的西域史地学派实际是当时学界的风向标,一论既出,马上为世人瞩目。

19世纪以来,中国为列强环伺,面临瓜剖豆分的危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掀起了边疆研究热潮,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以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为代表,学人普遍将关注边疆视为国体存没的特征。20世纪前期,在民族危亡的激发下,边政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以前的边疆史地研

① 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究,经历了从中国传统的史学发生,到以现代多学科为基础的新的研究内涵的质变,对当代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

回顾60年来的学术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国边疆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同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迎来了蓬勃兴旺时期,可以视为近代以来,继19世纪后期、20世纪20~40年代之后,第三次研究高潮,其重要标志是:

中国边疆学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突破了以往仅仅重视研究近代边界位置与走向的积习,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学学术史这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另一个是以史地研究为基础,走出了纯史地研究的范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的、多学科、贯通古今的学术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边疆学研究的视角广阔,学者众多,成果丰富。

同时,中国边疆研究的特点逐步形成:对边疆区域的探险考察、对以往边疆探查史著的发掘与研究,是学界热点,受到不同年龄段学者的共同关注,使中国边疆研究集人文地理、探险发现、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成果,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具有牵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前沿位置。

以西北边疆史研究为例,19世纪后期开始的新疆探险发



现,特别是1901年发现楼兰故城掀起的考古探险热,成为考古学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外著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编辑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亚洲探险之旅》等丛书,刊布了《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等系列档案文献,以及芬兰马达汉(曼纳林)的《马达汉日记》等数十部有关书籍。

作为边疆学术史的组成部分,1992年、1996年在乌鲁木齐连续召开了以总结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西北探险史成果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西域考察与研究”会议,就“19~20世纪西域考察及其学术遗产评估”、“西域历史研究”与“西域考古与文化研究”作了专题讨论。1996年会议,则以“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丝绸之路考古”、“丝绸之路文化”为议题,分别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992年国际会议之后,特别组织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有八个国家学者参加的考察队,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环塔里木探险考察。在考察的终点库尔勒市,考察队员专门讨论了探险史与边疆史研究的学术衔接问题。同时,会议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开始编辑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可以说,有两次会议做平台,我们将19~20世纪西域探险纳入了边疆学术史的库存,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范例之一。实际上,与我们更贴近的是中国学人的边疆区域考察纪实。

1917年,民国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单车远征,在新疆走了前无古人的路程,并以一部《新疆游记》记述了清朝覆亡之后新疆的现状,将西域的历史与未来纳入笔端。1919年“五四”前后,为解决西部交通问题,历时10个月、行程1.1万公

里,林竞在中国西北做了跨越几个省区的考察,并且率先以“开发西部”标榜。他的《亲历西北》(《西北丛编》)一书,为西北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内容。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内蒙访古》一文,才华横溢,格调高昂,别有韵致,不长的文章探及中国西北民族兴替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常年列入中学语文的教学范文。当代学者的边疆考察实践超过了中外前辈,众多成果令世人瞩目,但是他们个人的探险考察经历,却鲜为人知。他们用自己的实践,传承文明,感受文明,他们本身就是西北边疆学关注的内容。这是边疆学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的特点。为此,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边疆探索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以及《中国西部探险丛书》。在几种丛书之外,纪实之作比较有影响的尚有数十部,仅以新疆为例,有杨缵的《最后的罗布人》和《黑戈壁》以及穆舜英的《寻找楼兰王国》、王炳华的《沧桑楼兰》和《新疆访古散记》、张平的《草原民族文化的灵魂》等等。

在边疆学术史研究过程中,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19世纪以来外国人记述探险过程的著述的学术含量。新中国成立后,这曾经是有重大争议的话题。

19世纪中叶,在日趋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危机四伏,统治者既无力缓解国内众多矛盾,更无力抵御世界列强的入侵,盛极一时的清朝的衰亡已经不可逆转。在列强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之下,众多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旅游者,以及形形色色、身份迥异的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的边疆区域。从事探险考察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每个



人所抱的目的不同,方法各异,在对待当地居民以及中华文化等方面,态度、取舍更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他们从事探险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旅途所经,又往往属于人迹稀少、古今文明屡经兴替的边裔,有关文字记述相当罕见。除了某些以搜集古物为唯一目的的探险家,比如冯·勒柯克、格伦威德尔等等,他们对古代遗址的带有破坏性的发掘历来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一致谴责,其他大量的书籍毕竟出版在一个世纪之前,种种偏见与误差难以避免,而这正是今天边疆学术史研究的内容之一。所以,不能因为有片面性、局限性就忽视它们的价值,就将其置于视野之外。

关于这一点,有这样一个例证:

1907年,斯坦因抵达了罗布荒原,他的目标简单明确:前往楼兰故城。在途中,他的驼队突然止步不前,原来路边出现了两个罗布人的伯克,他们身着大清的五品官服,官服敝旧,已有补丁,而且并不合身,但漂洗干净,缝补针脚细密,着装中规中矩。这两个伯克是清代康熙时册封的世袭官员,他们特意来向探险队的外国人检验护照。作为大清臣民,这是他们的职责与承诺。这真叫斯坦因感慨不已。他走遍西部,所到之处,通行无阻,腐败的官方无不唯唯诺诺,从不敢拂其意,根本不用出示护照。唯独在这罕见人烟的“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斯文·赫定语)的罗布荒原,却遇到不惧强权的、维护大清国权威的罗布人。

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他的记述却为当时中国边疆地区的人文情感、政体结构,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

总之,中国边疆研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学科,也是充分